

香港二十世紀天主教堂的設計演變

陳天權

[摘要] 1842年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便有傳教士到來建立教堂，式樣仿效歐洲教堂，以巴洛克式和哥德復興式較為常見。其中天主教比較重視裝飾設計，透過瑰麗的雕刻和鮮艷的彩繪玻璃表現基督宗教思想。踏入20世紀，古典復興式風格逐漸取代哥德復興式，並混合多種式樣，意象紛陳。本文以20世紀上半葉落成的天主教堂為例，試論這個時期的建築特色和風格演變，從中了解天主教透過建築所表達的思想。

關鍵詞：哥德復興式、古典復興式、新巴洛克式、中國古典復興、折中主義、工藝美術運動、禮儀更新

古典與哥德風格

要辨識香港早期的教會建築，先了解古代歐洲兩種建築風格：古典主義（Classicism）和哥德式（Gothic）。前者源於古希臘和羅馬，強調對稱和比例，使用柱式（Order）、拱（Arch）、穹頂（Dome）、三角楣（Pediment）等結構和裝飾¹。

基督教獲古羅馬統治者承認後，初期興建的教堂沿用羅馬時代的公共會堂或法院設計，稱為巴西利卡（Basilica），由前廳、中庭和半圓形

¹ 古典柱式有五種，分別是多利克（Doric）、愛奧尼亞（Ionic）、科林斯（Corinthian）、塔斯干（Tuscan）和複合式（Composite）。Gavin Ambrose, Paul Harris and Sally Stone, *The Visual Dictionary of Architecture* (Lausanne: AVA Publishing SA, 2008), pp.187. Jonathan Glancey, *Architecture* (New York: DK Publishing, Inc. 2006), pp.89-111.

聖所 (Apse) 組成。後來發展為十字形平面，讓人想起耶穌受難的十字架。四臂長度相等的稱為希臘十字 (Greek cross)；橫短豎長的稱為拉丁十字 (Latin cross)。教堂內有中殿 (又稱主道或中廊, Nave)、高壇 (Chancel) 和半圓形聖所，中殿和高壇之間是十字形交叉 (Crossing) 所在，兩側為耳堂 (Transept)²。

到了中世紀年代 (11至14世紀)，一種擺脫古典建築的式樣興起，教堂採用肋拱 (Ribbed vault) 支承結構，減輕牆壁體量。以尖拱券 (Pointed arch) 代替古羅馬時期的半圓拱，又擴大窗洞面積，裝上精雕細琢、色彩斑斕的玫瑰窗 (Rose window) 或櫺花窗 (Tracery window)。教堂內外使用束柱 (Clustered column) 和飛扶壁 (Flying buttress)，有直衝雲霄的鐘樓 (Belfry) 和尖塔 (Steeple, Spire or Pinnacle)，以表達對天國世界的嚮往，後人稱此風格為哥德式³。

15世紀文藝復興 (Renaissance) 來臨，人們重新學習希臘和羅馬的古典建築，揚棄哥德式建築。17至18世紀，建築師打破古典的嚴謹規律，多用曲線或複雜線條作為裝飾，喜好強烈色彩，後人稱為巴洛克 (Baroque)。天主教會希望借助這種新奇而有魅力的建築風格，重新吸引信徒走入教堂⁴。

² Ernest Burden 主編，褚智勇等譯，《英漢建築圖解詞典》(北京：中國電力出版社，2007)，頁 48、16、211、256、297、94 和 125。

³ 莊裕光，《風格與流派》(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頁 29。Jonathan Glancey, *Architecture* (New York: DK Publishing, Inc. 2006), pp.245-247.

⁴ Gavin Ambrose, Paul Harris and Sally Stone, *The Visual Dictionary of Architecture* (Lausanne: AVA Publishing SA. 2008), pp.57. 劉丹，《世界建築藝術之旅》(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5)，頁 142-145。

18世紀中，崇尚理性的古典主義再度流行，建築式樣回歸希臘和羅馬的美學原則，稱為古典復興式（Classical Revival）。意大利是文藝復興的發源地，新古典主義亦由意大利帶起，這與當地出現考古風潮有關⁵

與此同時，在英、德等國家再度興起哥德式，稱為哥德復興式（Gothic Revival）。此式樣又稱浪漫主義（Romanticism），強調個性，提倡自然主義，主張採用中世紀的藝術風格以抗衡新古典主義⁶。

香港的哥德與古典

香港在1841年開埠，不久傳教士到來興建教堂。19世紀下半葉出現的天主教堂和修院，以哥德復興式較為常見，現存有伯大尼修院（1875年）和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1888年）等。

20世紀初，人口開始向尖沙咀遷移，教會先後在此區興建教堂。第一座天主教堂是玫瑰堂（1905年），設計仍是哥德復興式。緊接着是聖公會的聖安德烈堂（1906年），也採用同一風格。

⁵ 又稱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或分別稱希臘復興和羅馬復興。Jonathan Glancey, *Architecture* (New York: DK Publishing, Inc. 2006), pp.345-346. Gavin Ambrose, Paul Harris and Sally Stone, *The Visual Dictionary of Architecture* (Lausanne: AVA Publishing SA. 2008), pp.181. 劉丹,《世界建築藝術之旅》(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5),頁193。傅朝卿著,《西洋建築發展史話》(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5),頁431。

⁶ 又稱新哥德式（Neo Gothic）。Jonathan Glancey, *Architecture* (New York: DK Publishing, Inc. 2006), pp.397-398. Gavin Ambrose, Paul Harris and Sally Stone, *The Visual Dictionary of Architecture* (Lausanne: AVA Publishing SA. 2008), pp.138. 莊裕光,《風格與流派》(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頁77。

玫瑰堂平面原是巴西利卡式，1950年擴建中殿，變了拉丁十字形。玫瑰堂的哥德式元素很多，如尖拱券、尖頭窗、尖拱門、尖塔和飛扶壁等，增強了建築主體的垂直性，令信友不期然舉心向上，與主相遇⁷。

在20世紀初的歐洲，哥德復興式已趨沒落，香港也漸漸式微，取而代之是古典復興式，或古典復興式的變奏—巴洛克復興⁸（Baroque Revival）。以下提及的教會建築，如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小堂（1907年）、聖彌額爾小堂（1916年）、聖瑪加利大堂（1923年）、寶血會女修院（1929年），都採用這兩種形式。

中環堅道的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小堂是修會的第二代聖堂，由英籍建築師和意大利籍修女Melania Marin共同設計⁹，左右對稱，兩旁各有一座鐘樓，是香港現存唯一的雙塔式建築物。立面有六根科林斯式圓柱貫穿上下兩層，增強莊嚴感覺。高處開了一個哥德式教堂常見的玫瑰窗，展現豐富多采的畫面。為了適應亞熱帶氣候，聖堂外圍加建寬闊遊廊，這是殖民地建築常見特色。

跑馬地天主教聖彌額爾墳場內設有聖彌額爾小堂，用作舉行安息禮，是墳場的第二代小堂。入口以多利克柱承托三角楣，對上還有一個長方形山牆，刻了拉丁文PAX，是「平安」的意思。小堂平面為十字和圓形的重疊，穹頂開了四個半圓窗，上置小塔（Lantern），山牆頂和小塔頂均置有十字架¹⁰。

⁷ 林社鈴，〈玫瑰堂百載話舊〉，玫瑰堂建堂百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小組，《綻放百載：玫瑰堂建堂百週年紀念特刊》（香港：玫瑰堂，2005），頁33。

⁸ 又稱新巴洛克（Neo Baroque），採用巴洛克年代的設計裝飾，以求變化。

⁹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的詹秀璉修女提供資料。

¹⁰ 黃棟才，《圖說香港歷史建築：1841-1896》（香港：中華書局，2012），頁48。

跑馬地樂活道的聖瑪加利大堂，由意大利建築師幹尼刺（U. Gonella）設計¹¹。它像羅馬神殿般坐落於高地上，信眾拾級而上，仰望巨形門廊，左右各有一座聖像¹²迎接信眾步入教堂。門廊上方有三角楣，屋頂再重覆加三角楣，兩者之間有一個裝飾豐富的玫瑰窗。可惜教堂高度不足，玫瑰窗被三角楣遮擋。室內天花呈筒形，整齊排列長方形的浮雕小格，前端有一半圓形的格子窗，像天上的眼睛，垂顧教堂內的信眾¹³。

深水埗元州街的寶血會女修院，立面左右對稱，門廊設於中央，兩端高處可見三分式的戴克里先窗（Diocletian window），這是一種流行於古羅馬浴池的設計，18世紀初為英國建築師使用¹⁴。寶血女修會原是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的第三會，1922年獨立，在筲箕灣建立第一座修院，1929年遷至元洲街¹⁵。

法式古典與現代

巴黎外方傳教會和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是較早來港工作的法國修會，在薄扶林的伯大尼修院（1875年）便由前者興建¹⁶。該會於1915年購入中環滙豐銀行高級職員宿舍，1917年建成法國傳道會大樓，由李柯

¹¹ 根據教堂奠基石資料。

¹² 聖伯多祿（St Peter）和聖保祿（St Paul）

¹³ 夏其龍，《香港傳教歷史之旅（第三冊）》（香港：教區福傳年專責小組，2006），頁 21-25。

¹⁴ 參考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website：<https://global.britannica.com/technology/Diocletian-window>

¹⁵ 黃棟才，《圖說香港歷史建築：1920-1945》（香港：中華書局，2015），頁 98。

¹⁶ 夏其龍編，《內外縱橫太古樓》（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2），頁 14。

倫治建築師行（又譯利安，Leigh & Orange）設計¹⁷。大樓高三層，以花崗石和紅磚建成，西北角設有小堂，上有小穹頂（Cupola）。大樓側面的遊廊有多組雙柱支撐，正門門廊有破頂式三角楣¹⁸（Broken pediment），帶有巴洛克的特徵。

1848年法國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應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科蒙席神父（Fr. Theodore Forcade）要求，派遣4位修女來港服務。初期在灣仔建立聖童之家，收養被遺棄的嬰兒，其後開設學校和醫院。1907年獲政府批地在跑馬地黃泥涌道興建加爾瓦略山會院，由李柯倫治建築師行設計。樓高四層，立面中間和兩側開了尖頭窗，其餘部分以尖拱貫通，柱間有紅白相間的磚帶結構，地下有一列圓拱和闊圓拱¹⁹。整座建築混合了哥德式、古典式和安妮女王時期²⁰（Queen Anne）風格。1916年，修院逐步遷往銅鑼灣，舊院在1927年開辦學校，成為今天的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1930年，聖保祿女修會在銅鑼灣修院範圍興建基督君王小堂，由法國和比利時銀行注資成立的義品地產公司²¹（Crédit Foncier d'Extrême-

¹⁷ 參考 Leigh & Orange website： <http://www.leighorange.com/en/#projectSection> [2017-01-20]

¹⁸ Owen Hopkins，呂奕欣譯，《閱讀建築的 72 個方式》（台北：遠流出版事業，2014），頁 121。

¹⁹ 法國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港服務簡史網頁：

<http://www.spcspr.edu.hk/sistershk.htm>[2017-01-20]。黃棣才著，《圖說香港歷史建築：1897-1919》（香港：中華書局，2011），頁 64。

²⁰ 安妮女王時期由 1702 至 1714 年，19 世紀下半葉復興當年的建築風格，強調材料和紋理，廣泛使用紅磚和磚帶結構。Sarah Cunliffe & Jean Loussier, *Architecture Styles Spotter's Guide* (San Diego, CA: Thunder Bay Press, 2006), pp.170-171.

²¹ 有關此公司的資料可參考：

http://www.academia.edu/14759583/Masterplanning_the_Future_Modernism_East_and_West_and_Across_the_world [2017-01-20]

Orient) 興建, Joseph V. Chanatong設計²²。這是一座富有裝飾的聖堂, 外牆圍以科林斯式列柱, 入口立面以巨柱承托三角楣, 楣下額枋寫了一句拉丁文: REGEM REGUM VENITE ADOREMUS (讓我們來朝拜萬王之王)。楣頂豎立基督君王像, 屋頂有一座鐘樓。聖堂平面呈拉丁十字形, 中央交叉點覆蓋一個穹頂。

隨着新的建築材料和技術出現, 歐洲有不少新造型的教堂出現²³, 香港的教堂設計亦開始轉變。建築師一方面保留傳統模式, 另一方面採用時興的潮流, 因此同一時期有多種風格百花齊放。

位於九龍城太子道的聖德肋撒堂用鋼筋混凝土興建, 是當年區內最高的建築物。荷蘭籍本篤會士葛斯尼神父 (Dom Adelbert Gresnigt) 負責設計, 他擅長以中式風格興建教會建築, 但此方案不為教區接受, 結果他作出修訂, 揉合葡籍建築師A.H. Basto和義品地產公司的建築師尹威力 (Gabreil van Wylick) 的心思, 1932年建成一座有八角形塔樓的拜占庭式教堂²⁴。立面加了當時流行的裝飾藝術²⁵ (Art Deco) 特色, 旁邊有座獨立鐘樓, 乃羅馬式風格²⁶ (Romanesque) 的再現。教堂後面的巴芬道 (Belfran), 名字由「比利時」和「法國」兩字結合而成, 表達了對義品的紀念。

²² 根據教堂奠基石資料

²³ 趙一舟,《我們的聖堂》(台南:聞道出版社,2008),頁36。

²⁴ Sergio Ticozzi, Pime,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an Archives, 1997), pp.152.

²⁵ 此風格名稱源於1925年在法國舉行的現代裝飾和工業藝術國際博覽會,特點是簡化古典裝飾,變成幾何形狀和線條。Sarah Cunliffe & Jean Loussier, *Architecture Styles Spotter's Guide* (San Diego, CA: Thunder Bay Press, 2006), pp.220-221.

²⁶ 羅馬式又譯羅曼式,10世紀末至12世紀流行於歐洲,仿效羅馬時代建築,牆身厚重,窗戶細小。Sarah Cunliffe & Jean Loussier, *Architecture Styles Spotter's Guide* (San Diego, CA: Thunder Bay Press, 2006), pp.32-33.

在教堂斜對面的瑪利諾修院學校亦結合多種風格，由李杜露建築師樓（又譯伍德，Messers Little, Adams and Wood）設計²⁷，1937年落成。面向窩打老道的塔樓有羅馬式和裝飾藝術特色，從正門內望則見一度巨大的哥德式拱門。修會認為尖拱門代表瑪利諾修女的頭巾，當學生經拱門進入校園時，代表進入修女之心²⁸。

義品地產公司在香港的作品還有位於赤柱的嘉爾默羅隱修院（1936年）²⁹，其設計已擺脫古典或巴洛克式風格，採用歐洲流行的現代主義，簡約實用，在當時來說十分前衛。修院呈U字形，另一面建有高牆，讓修女過着與外界分隔的生活。面向赤柱村道一方設有小堂，門口和窗門加上新穎的三角裝飾，令人聯想起哥德式的尖拱窗。

中華古典復興

進入1930年代，香港的教堂或修院設計出現新的轉變，加入大量中國式元素。此風格源於內地，可稱為中華古典復興式，也可說是折中主義³⁰（Eclecticism），組合了各種建築式樣。在港的天主教堂例子有黃竹坑的華南總修院（1931年，今聖神修院）和赤柱的瑪利諾神父會院（1935年）；基督新教有沙田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31-1939年）、銅鑼灣的聖馬利亞堂（1937年）和土瓜灣的聖三一堂（1937年）。

²⁷ Amy M.W. Ho ed., *Forever be True : The Love & Heritage of Maryknoll* (Hong Kong : Maryknoll Convent School Foundation, 2009) , pp.65.

²⁸ 根據 2013 年學校開放日所展示的介紹

²⁹ 參考 2008 年至 2009 年在文物探知館舉辦的「共建香江：法國築蹟 160 年」展覽。

³⁰ 莊裕光，《風格與流派》（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頁 78-79。

為何教堂由歐洲式樣轉為中式？這要由19世紀晚期教會在華推行本土化（本色化）運動說起。早年傳教士興建的教堂主要採用哥德式或古典式，但有當地人指教會是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工具，以致教堂和傳教士經常成為被攻擊的目標。1900年義和團事件爆發，接着有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教會覺得應該洗脫西方色彩，結合中國文化傳教，以消除民眾誤會³¹。

1922年中國知識界發起「非基督教運動」，打擊西方在華的宗教勢力，削弱西方影響。1924年，教廷首任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Celso Benigno Luigi Costantini）在上海召開中國天主教第一屆全國主教會議，在宗教建築上作出指示：「起造教堂所用建築、裝飾物，不可一味採用外來藝術形式，得因時地之宜，盡可能使用中國建築樣式。³²」

該次會議還決定在香港興建華南總修院，由參與興建北京輔仁大學的葛斯尼神父設計，香港的李杜露建築師樓負責監督，1931年建成。原先計劃興建四合院式，後因過於龐大和資金不足，只建造一列兩層高的長形樓房（南樓）³³。外貌像中國宮廷建築，但加建了遊廊，以中式紅柱支撐。屋頂有綠瓦、飛簷和斗拱，正脊兩端以鴟吻裝飾，中央則豎立

³¹ 梁家麟，《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香港：天道書樓，1995），頁102-117。

³² 顧衛民，《近代中國基督宗教藝術發展史》（香港：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2006），頁103。

³³ Coomans, Thomas, 'Sinicising Christian Architecture in Hong Kong: Father Gresnigt, Catholic Indigenisation, and the South China Regional Seminary, 1927-31', *Journal of the RAS Hong Kong Branch*, Vol. 56, 2016, p.133-160.

一座凱爾特十字架（Celtic cross）。1956年增建的大聖堂，由本地建築師陸謙受設計，內部也富有中國傳統特色³⁴。

瑪利諾神父會院由美國天主教傳教會（又稱瑪利諾男修會）興建，美國紐約建築師Henry J McGill設計，1935年落成。會院樓高三層，紅牆綠瓦，與紐約總部一樣都是中國風格，體現了瑪利諾對中國的感情³⁵。主樓採用單檐歇山頂，有兩翼伸出，呈凹字，形似故宮的午門。一樓設有聖堂，門旁有八角形彩繪玻璃窗，中央呈現XP合體圖案（Chi Rho），乃希臘文「基督」的簡寫。聖堂天花呈筒形，中殿兩側的紅色支柱加上斗拱，揉合中西特色。

華南總修院和瑪利諾神父會院的興建目的是給神父和修士學習中國語文，以便他們赴華傳教，同時給他們回港歇息。建築設計採用中式，可使他們在中國的氛圍下學習，加強傳教之決心。

不過，當時興建這種有別於歐洲傳統式樣的教堂，也受到一定阻力。內地有不少傳教士抵制中國本土化運動，他們較喜歡哥德式和其他西方風格³⁶。1920年代至40年代出任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的恩理覺神父（Fr Enrico Valtorta）也對中式教堂持反對意見，當年由教區負責的聖德肋撒堂便採用了歐洲式樣。

³⁴ 林社鈴，〈教會建築本地化：聖神修院的建築與風格〉，無日期，
〈http://www.theology.org.hk/psa/articles/papers/booklet/2010_8.pdf〉 [2017-01-20]

³⁵ 何心平，〈美國天主教傳教會與香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頁89。

³⁶ 高曼士、徐怡濤，〈舶來與本土：1926年法國傳教士所撰中國北方教堂營造手冊的翻譯和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頁18。

隨着戰雲密布香江，教會沒有能力再建造精雕細琢的教堂。戰後世界潮流改變，流行簡約的現代主義，中式教堂便退出歷史舞台。不過，1955年在深水埗落成的聖方濟各堂仍見到中式屋頂。該教堂由葡籍教友甘曼斯（Francisco D'Assisi Gomes）家族資助興建³⁷，混合了古典式、哥德式和中式元素。當時石硤尾大火發生不久，區內聚居大批住在臨時房屋的居民，建造具中式教堂可令他們產生親切感。

工藝美術運動

1950至60年代香港出現一批麻石教堂，當中以新教佔多³⁸，天主教有何文田的恩主教小堂（1952年，今教區傷殘人士牧民中心）、粉嶺聖若瑟堂（1953年）和聖母神樂院（1955年）。這種風格可歸入「工藝美術運動」（Arts and Crafts Movement），目的是挑戰工業化的機械生產，強調手工製造，使用天然物料，讓建築物反璞歸真³⁹。

聯和墟的粉嶺聖若瑟堂由意大利宗座外方傳教會的賴法禹神父（Fr. Ambrose Poletti）籌建⁴⁰，以麻石築砌。聖堂與活動室之間以門廊連接，門廊之上加建一座石砌鐘樓，懸掛了三個銅鐘。每次舉行彌撒前，工作人員按傳統用人手敲鐘通知信友，具有鄉村教堂色彩。

³⁷ 李嘉聰，〈深水埗顯著的地標〉，《聖方濟各堂金禧特刊》（2006），頁 25。

³⁸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九龍教會（1950年）、長洲浸信會堂（1951年）、聖公會聖路加堂（1954年）、佑寧堂（1955年）、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1955年）、中大崇基學院的禮拜堂（1961年）等。

³⁹ Gavin Ambrose, Paul Harris and Sally Stone, *The Visual Dictionary of Architecture* (Lausanne: AVA Publishing SA, 2008), pp.49.

⁴⁰ 《粉嶺聖若瑟堂慶祝建堂五十週年特刊》（2004），頁 9-10。

聖母神樂院的設計秉承熙篤會的樸素作風，用麻石築砌，旁有一座四層高的石砌鐘樓。聖堂平面為巴西利卡式，中殿兩旁有供修士使用的古老座椅，祭台牆壁懸掛耶穌釘十字架圖像，除此之外堂內並無其他裝飾圖案。

教會禮儀更新

1962至1965年梵蒂岡舉行第二次大公會議（簡稱「梵二」），推動一系列革新，包括「禮儀革新」。梵二的《禮儀憲章》對舉行禮儀的空間（即聖堂）作出指示：「在建築聖殿時，務必注意，使能適合禮儀行為的執行，以及信友的主動參與。」聖堂的建造、祭台的形式、聖堂內部的設施和布置，都應配合革新的禮儀⁴¹。

舊式教堂的祭台緊貼聖所牆壁，有些更有裝飾性的巨型壁龕，安放主保聖人像，這種設計源於昔日司鐸與信友一同面向祭台崇拜，並設有欄杆將祭台與信友席分隔。教會以往強調神職人員的角色，信友僅是「觀望」而已。梵二後，禮儀不再是神職人員獨攬的行動，因此作出改動，在鄰近信友席的地方另置新的祭台，以利信友主動參禮⁴²。有些教堂設有跪領聖體的欄杆，用以分隔祭台與信友席，梵二後被拆除，令信友感覺與祭台更為接近。

現今司鐸在新置的祭台後方舉行彌撒，大部分時間面向信友，亦可圍繞祭台而行。祭台象徵基督，為凸顯其中心地位，布置盡量單純化，

⁴¹ 趙一舟，《我們的聖堂》（台南：聞道出版社，2008），頁1。

⁴² 趙一舟，《我們的聖堂》（台南：聞道出版社，2008），頁37。

任何非舉行禮儀所需的物品包括聖體櫃，不可置於用來舉行彌撒的祭台上⁴³。

梵二認為教會沒有把某一種建築風格看作是本有的，而是就各民族的特性與環境，及禮儀的需要，採納各時代的作風。唯一的條件，是對聖堂和神聖典禮保持應有的尊重和敬意⁴⁴。

香港有不少古老教堂在梵二後作出內部改建，把舊祭台拆去（如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小堂），以配合禮儀革新。即使保留祭台，也不作彌撒之用（如聖伯多祿聖保祿堂）。原置於舊祭台的聖像，梵二後大多改放旁邊的小祭台，中央位置留給耶穌苦難十字架，以凸顯以耶穌基督為中心的地位。

基督君王小堂在1973年維修時，將正祭台移離聖所後壁，並拆去原有的領聖體欄杆。聖所原有一座聖體亭，兩旁站立一對持燈的天神像，現今聖體亭移放外面的花園，天神像轉送給聖瑪加利大堂⁴⁵，令信友的注意力集中在禮儀上。

有些教堂如聖瑪加利大堂和基督君王小堂，設有閣樓，放置大型風琴，昔日聖詠團在該處唱詩。梵二後聖詠團改到樓下，與信友坐在一起。舊有的風琴因長期停用而壞掉，在香港無人懂得修理，結果淪為裝飾品。

⁴³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辦事處編，《梵二禮儀空間手冊》（香港：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辦事處，2014），頁 56-58。趙一舟，《我們的聖堂》（台南：聞道出版社，2008），頁 64。

⁴⁴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辦事處編，《梵二禮儀空間手冊》（香港：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辦事處，2014），頁 2。

⁴⁵ 法國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基督君王小堂網頁：
http://www.srspc.org.hk/tc/christ_the_king_chapel.php [2017-01-20]。

結論

建築和藝術是表達宗教思想的重要工具，每個年代的人有不同的審美觀，以及希望表達的思想。香港早期教堂跟隨歐洲，採用哥德復興和古典復興風格設計，但因技術和材料所限，未能依足歐洲式樣，只採用有關風格的部分元素。另外亦因應本地氣候和華人習慣而加入遊廊或中式瓦頂，令建築風格混雜不純。

踏入20世紀30年代，教堂式樣出現新的轉變。最具特色的是中華古典復興式建築，試圖將基督教信仰融入地方文化中，一方面吸引華人信教，另一方面亦培養傳教士赴華傳教的熱情。當時本土建築師並不熟悉教堂設計，教會多聘請外籍建築師以西方技術結合中國傳統特色建造教堂。但這風潮在港盛行不到十年便因戰爭而沒落，戰後雖有聖方濟各堂效法中式設計，但未能成風，很快就被簡約及實用的現代主義取代了。

聖堂內部為信友聚集的地方，其建築和室內設計必須提升信友對耶穌臨在其中的意識。1960年代梵二推動禮儀革新，簡化祭台裝飾，以免分散信友對禮儀的注意力。因此棄用舊有的大型祭台，另放一張與聖所牆壁分開的祭台，讓司鐸站在祭台後方，面向信友席舉行彌撒，以拉近彼此的距離。

教會又認為新建的教堂不應抄襲古代式樣，可採用本地藝術風格。因此香港早期留存下來的歐式和中西合璧教會建築，便顯得份外珍貴。這些建築歷史悠久，現已成為香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令城市增添獨特景觀。文中提到的教堂都是區內地標，大部分已被古物諮詢委員會評級，個別更是法定古蹟。

要界定某幢西式建築屬於哪種風格，有時頗富爭議，不同的人從不同角度觀察，會有不同的理解，對風格的命名或有不同。若按歐洲建築細分，還有更多風格名稱。為免造成混淆，本文只用幾個主要風格來說明20世紀上半葉的教會建築，讓一般讀者先有概括了解，再從細部欣賞前人設計的心思。

[ABSTRACT] Since Hong Kong became a British colony in 1842, missionaries came and built churches on the island, of which Baroque and Gothic Revival styles were the most common. The architecture of Catholic churches emphasizes decorative elements, using beautiful carvings and colourful stained-glass windows to express Christian theolog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style of Classical Revival replaced Gothic Revival, and hybrid architecture was also prevalent.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architectural styles of Catholic church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religious beliefs as revealed by these styles.